



士人典范 苏东坡

彭文良 著

他极具才情，也不失深邃之思想，
其史评、策论、奏议、易传，
无不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他博学能文，早中科第，
年少即名动天下，
然一生仕宦坎坷，屡遭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士人典范

苏东坡

彭立良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人典范：苏东坡 / 彭文良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8

ISBN 978-7-5534-5542-6

I. ①士… II. ①彭… III. ①苏轼 (1036~1101)—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6335 号

士人典范：苏东坡

彭文良 著

出版策划：孙 昶

选题策划：孔庆梅

责任编辑：赵晓星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7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4-5542-6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本书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No. CQDXWL-2014-Z012),特此致谢!



前言

苏轼（1036—1101），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他学问赅博，是文艺领域里难得的多面手，诗歌清雄豪放，信手挥洒，为宋诗的最高代表，与北宋的开派作家、同时也是自己弟子的黄庭坚双峰并峙，合称苏黄；其歌词新天下耳目，为词家指出向上一路，向来为词学重镇，其雄深雅健的词风，与豪放沉郁的辛词相近，并称苏辛；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纵横开阖，汪洋恣肆，极具气势，亦自成一格，其成就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并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书法不拘常格，常乘兴而作，自觉有拂拂酒气，从十指间出，观之每有天风海雨之势，与蔡襄、米芾、黄庭坚并称北宋书法四大家；绘画方面，与文同并开湖州画派，不仅在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臻于极诣的著名画家。一人而兼众长，绝无仅有。

苏轼极具才情，也不失深邃之思想，其史评、策论、奏议、易传，无不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他立足儒家思想，少年即奋厉有当世志，但同时也兼容佛老庄禅，其中是受庄学思想的沾溉尤深，儒释道精神在身上浑融一体，故其顺势可以进取，逆势可以养性，达不张扬，穷不颓放，各家思想在他不同时期为其提供不同的滋养。苏轼进取时，却不汲汲于功名利禄，安时处顺、委任运化时，又不消极

颓废，他积极而又恬然的处世方式为不同取向的文人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借鉴，这也许就是千百年士人痴迷于他的原因所在。

苏轼富才情、广学问，然在仕途方面却是坎坎坷坷，并非一帆风顺。他早年高中科第，得志较早，观其嘉祐年间的策论、史评，亦主张变革时政，改革时弊，然熙宁初回朝，值王安石变法时，他反对最力，认为国家之存亡，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弱，历数之长短，在风俗之厚薄，不在富贫，带有强烈的儒家理想主义色彩，与王安石主张生财寻利的法家思想水火不容，随后先是被排挤出京，被迫外任近十年，后来发生更为严重的乌台诗案，贬谪四年多，几乎淡出政坛。元祐还朝，本来是旧党的天下，可苏轼先与司马光在存废王安石新法方面激烈冲突，司马光主张全面废除新法，多少有些意气用事，苏轼主张根据实际利弊论存废，这次苏轼倒是理性很多；随后与程颐、朱光庭、贾易、刘摯、王岩叟等结怨，深受洛党、朔党的背腹攻击，被迫再次外任。至绍圣、元符年间，新党执政，曾遭苏辙猛烈攻击的李清臣、章惇等还朝，苏轼因此而受报复自是意料中事，一贬再贬，至其病卒，几乎被排挤出朝政之外。综观其一生，大概刚毅正直，始终坚持自己看法与判断，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是其宦海沉浮的主要原因，就此而论，苏轼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士而已，很难算是老练老道的政治人物。

王国维曾经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逝世已千余年了，但他的人格与精神

仍熠熠生辉，如何与时俱进地发掘出苏轼的当代价值，应该是苏学研究者的任务之一。自宋以来苏轼的喜爱者代不乏人，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清代以前的材料以零散的述论、点评为主，近代以来，结合新的学术方法与要求，日趋系统、深入，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但过往研究中，线性的述论比较多，比如关于苏轼生平、交游、思想、个性方面，几乎都是按时间顺序，逐一展开，缺点就是某些主题，往往淹没在这种直线式叙述中，没法得到应有的突出和展开，故本著力图突破此弊，除首章外，其他皆以专题形式，集中论述某一主题。近年来一些新著，考据则难免流于繁琐，读之卷终，让人昏然欲睡，阐述则片面追求可读性，常常过度演绎，不免穿凿附会，有违事实，本著不重考据，但力图言之有据、持之有故，所有述论，或取自苏轼自身材料，或取自宋人笔记史料，皆有出处和依据；希望有可读性，但力避虚构和想象。当然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更兼仓促成书，有违初衷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14 年夏作者于重庆大学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传奇人生:身行万里半天下	1
第二章 旷达情怀:一蓑烟雨任平生	67
第三章 以德报怨:相逢一笑泯恩仇	97
第四章 心系民瘼:穷年蒿目忧黔黎	146
第五章 奖掖后进:洗樽致酒招良士	173
第六章 风趣幽默:笑歌惟取性情真	200

第一章 传奇人生：身行万里半天下

苏轼祖籍河北栾城，所以《苏轼文集》中如《亡妻王氏墓志铭》、《乳母任氏墓志铭》、《书鲜于子骏楚词后》皆称自己为“赵郡苏轼”，《苏廷评行状》称其祖父苏序“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据苏洵《族谱后录上篇》可知其先祖为唐初著名诗人苏味道，味道因过被贬四川眉山，自此苏轼祖上始定居于此：“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玄。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①。苏轼太祖名铎，娶黄氏，高祖名祐，娶李氏，曾祖名杲，娶宋氏，祖父名序^②，取史氏，以上各代皆不仕。苏轼的祖父“疏达不羁”，“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衣食稍有余，辄费用，或以予人立尽”，这种豪爽善良的个性对苏轼很有影响。苏轼父亲兄弟三人，长曰澹，终生未仕，且先苏序而卒；次曰涣，进士及第，终于都官郎中，利州路提点刑狱。苏洵最少，幼时游荡不学，壮年始发愤读书，然屡试不中，后闭门苦读，穷究六经、遍览百家，终以文章知名，后携二子举进士，因苏轼兄弟同中高第，而

①（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版，页378。

② 因为避讳的缘故，苏轼文集中但凡提及“序”字即以他字代替，宋人早有论及，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说无‘益’字。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安，遂改作‘引’，而谓‘字序’曰‘字说’。张芸叟父名盖，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周密《齐东野语》卷四：“杜甫父名闲，故杜诗无闲字。苏子瞻祖名序，故以序为叙，或改作引。曾鲁公父名会，故避之者，以勘会为勘当。蔡京父名准，改平准务为平货务。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讳也。”（宋）陆游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页74。）

名动京师，声震天下，后世目为三苏。^①

少年野性

苏轼于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十二月十九日^②（公历为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出生于眉山县沙碛行。据传苏轼出生吸尽了天地精华，眉山草木为之尽枯^③。八岁入小学^④，老师为眉山天庆观道士张易简^⑤。苏轼的天赋和颖悟在孩提时候即崭露无遗，深获老师喜爱。^⑥张易简虽为道士，但教授内容仍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四书五经是其传习的主要内容，这些为苏轼的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在苏轼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晚年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不谓有白发，犹诵论语辞。”^⑦

-
- ①（宋）王辟之著，吕友仁点校：《澠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页42：“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嘉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 ②苏诗《李委吹笛》题序云：“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颇知音。”
- ③（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页97：“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 ④（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7月版，页311，《范文正公文集叙》：“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上梅直讲书》：“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文集页1385）。案：以下苏轼散文皆出自《苏轼文集》，为避繁琐，但云文集页××。
- ⑤《众妙堂记》：“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文集页361）《题李伯祥诗》：“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文集页2136）。
- ⑥《道士张易简》：“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见（宋）苏轼撰，赵学志校注：《东坡志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1月版，页124。
- ⑦《和饮酒二十首（并引）》，见（宋）苏轼撰，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0月版，页1881。案：以下苏轼诗作皆出自《苏轼诗集》，为避繁琐，但云诗集页××。

在天庆观学习三年后，苏轼回到家中，课业主要由母亲讲授。母亲程氏对苏轼的影响，于学业之外，主要有二，其一以道义相期许、以名节相砥砺，据《宋史·苏轼本传》云：“（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①范滂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后汉书》云：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②

程氏希望幼年苏轼像范滂一样为了道义不惜舍身成仁，很显然苏轼正直刚毅的个性即受此影响。

其二，程氏引导少年苏轼要有仁爱善良之心。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云：

少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觝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忤之诚，信于异类也。有野老言：“鸟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由是观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页10801。

②（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页2207。

之，异时鸟雀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文集页2374）

文中的“武阳君”即程氏，乃卒后的封号。所谓“物皆我与”，即视草木鸟兽皆为人的同类，当以悯人之心爱惜万物，苏轼“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无疑也是受到“性仁行廉”（《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文集页578）的母亲的影响。

庆历七年（一〇四七）十二岁，这一年苏轼祖父苏序在家离世，第三次参加京师考试的苏洵再次失利，在南游途中接到噩耗，赶回眉山。此后十年间，苏洵一直不曾出蜀，除了闭门苦读之外，也开始着力培养苏轼兄弟，把仕宦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年幼的儿子身上。同普天下的父母一样，皆望子成龙，苏洵虽对苏轼兄弟要求极严，但可贵的是并没有压制其个性的发展，相反苏轼的少年生活充满了乐趣，并表现出十足的“野性”。

与所有的孩童一样，少年苏轼也贪玩好耍、顽皮可爱，他自叙“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天石砚铭（并叙）》，文集页556）少年苏轼也坐不住，趁苏洵不在家时候，也常常溜出去游走玩耍，至成年以后，常与苏辙饶有兴致的回想起那段快乐时光：“忆昔与子皆童卯，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和子由蚕市》，诗集页162）

从出身情况论，苏轼家属于中小地主，薄有资产，祖上虽世代不仕，但至父辈起看重仕途经济，开始重视教育，这在苏轼兄弟的论述中多有提及，如苏辙曾云：“先君平居不治生产，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辑而校之，以遗子孙。”^①苏轼亦云：“我非田农家，安能事粗糲。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送宋君用游犇下》，诗集页2603）、“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初……门前万

① 《藏书室记》见，（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栟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版，页31。

竿竹，堂上四库书”（《答任师中家汉公》）、“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和陶郭主簿》），可看出，从苏洵一辈起，读书成为家族的主业。与世家望族相比，苏家无疑贫寒得多，所以苏轼文字当中多处提及自己身世的卑微贫贱，如“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密州谢上表》，文集页651）、“臣少贱而鄙”（《谢除兵部尚书赐对衣金带马状》，文集页698）、“臣草芥贱儒，岷峨冷族”（《英州谢上表》）；有时甚至以农人自许如“臣奋身农亩，托迹书林”（《徐州谢上表》，文集页652）、“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跋李伯时卜居图》，文集页2216）。从实际的情况，苏轼家不是大户，但也不是农民家庭，没有经历过传统的耕读生活，但他年少时期生活在最底层，可能更多的出于一种好奇，确曾体验过一些农人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有过诗意的描述：

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鞞。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寻山跨坑谷，腾趯筋骨强。烟蓑雨笠长林下，老去而今空见画。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书晁说之考牧图后》，诗集页1966）

这是一首题画诗，从其中的“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等语看，没有亲身经历自难道出。

此外，少年苏轼还尝试过一些嫁接植物、培育作物的活动：

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胶合其罅。予少时颇能之。尝与子由戏用苦楝木接李，既实，不可向口，无复李味。（《接果说》，文集页2363）

苏轼用苦楝与李树相嫁接，虽然最终“不可向口，无复李味”，却展现了他不循常规、不拘格套的个性，这种个性即“野性”：

洵有二子轼、辙，韶齿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盆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上张侍郎

第一书》)①

文中的张侍郎即张方平，至和元年（1054）十一月，知成都府任，苏洵父子嘉祐元年（1056）春离眉山赴京，此书应作于此段时间之内。苏洵上书张方平的目的是请求张向朝廷公卿引荐苏轼兄弟，而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自然在书信中就会介绍其个性、学问情况，在父亲眼中，苏轼“仪状甚野”、“年少狂勇”。这封书信可以解读出的信息至少有二：其一，年少苏轼确实有狂野的一面；其二，苏洵对此，并不讳言，似乎还颇有些得意。苏洵对苏轼的“野性”评价一以贯之，如《名二子说》云：

轮辐盖轸，皆有取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嘉祐集笺注》页414）

苏洵眼里二子个性有别，苏轼以“不外饰”，明显区别于苏辙的“善处祸福之间”，“不外饰”即任由其“甚野”之性自然表露。与其父的评价近似，苏轼在其诗文中多处承认自己确实有朴野之性：

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出入岩峦千仞表，较量筋力十年初。（《游庐山次韵章传道》，诗集页619）

某近领腊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审起居住胜。某此与贱累如常……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少有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答杨济甫》，文集页1808）

生而赋朴野之性，愚不识祸福之机。但知任己以直前，不复周防而虑后。动触时忌，言为身灾。挤而去之，则为有功；引而进之，亦

①（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版，页345。

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禄为意，而以仁厚为心。（《谢监司荐举启》，文集页1335）

名动京师

嘉祐元年（1056）三月间苏洵携苏轼兄弟，北经成都、剑阁出川，由陆路赴京师^①，约五六月间抵达，寄食于一寺庙里^②。八月顺利通过开封的秋试，取得次年春天礼部考试的资格。嘉祐二年正月六日，朝廷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知制诰韩绛，并权同知贡举，主持礼部考试。苏轼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简洁流畅，无所藻饰，一反宋初以来的险怪奇涩之“太学体”，梅尧臣得之以为荐，欧阳修阅毕赞赏不已，初以为是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乃置第二^③。不妨看一下这篇满分作文：

论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

① 《凤鸣驿记》云：“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文集页375）丙申即嘉祐元年，扶风镇凤鸣驿在陕西境内。

② 《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予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文集页622）

③ 《宋史·苏轼传》云：“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

“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谨论。

该文通篇立足于儒家的仁政思想，阐发了苏轼的赏罚观，认为赏宜从宽，可赏可不赏则赏，罚宜从轻，可罚可不罚则不罚；从论证技巧上看，开篇梳理上古至商周的赏罚情况，以明确自己的观点，接下来分引经典加以阐述，亦不失为议论文方面的典范之作。传为佳话的是文中第二段为论证上古罚宜从轻，编撰了尧帝与执法官皋陶之间的对话，当时以博学著称的梅尧臣、欧阳修皆不知道出处，事后询问才知出自于苏轼的杜撰，这种胆识确实令人叹服：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

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①

苏轼敢在事关命运的考试中杜撰典故，勇气过人，座主欧阳修在“士以剽裂为文”（《太息送秦少章》，文集页1979）的大环境下不拘一格，擢置苏轼实际上所承受的压力也是空前的，文风平易的苏轼中礼部试后，引起了其他因坚持艰涩诡怪文风而落第的举子的强烈不满，他们“聚而见讪”，“群嘲聚骂，动满千百”（《谢欧阳内翰书》，文集页1423），当然欧阳修并没有因为这些阻力而动摇，仍鼓励苏轼“不为世俗之文”，并决定“放他出一头地”，有意将苏轼栽培为未来的文坛盟主。^② 此年三月初五，仁宗皇帝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进士，十一日公布名单，至此苏轼兄弟正式考中进士。

正在苏轼父子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四月七日眉山传来程氏去

①（宋）陆游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页102；另外宋人的相近记录尚有（宋）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页178：“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时，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幕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另（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页115：“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所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②如（宋）朱弁撰、孔凡礼校点：《曲洧旧闻》（与《师友谈记》、《西塘集》、《耆旧续闻》合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8月版，页204：“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欧阳）绰畚募岸坡，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另外（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08亦载：“欧阳公谓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开廓，勿造语，及模拟前人。’又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曰：‘轼所言乐，乃修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另外（宋）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与梅圣俞》，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12月版，第八册，页195：“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